



【温酒闲谈】

盈利预测是反映新股前景的重要指标,颇具参考价值。若招股书缺乏相关资料,会削弱新股透明度。

香港股市监管者应强制新股披露盈利预测

温天纳

很多人说,香港的新股市场比A股相对成熟,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也较活跃,监管制度也较为严密。不过,在一些灰色地带,若监管条例并无硬性规定的话,情况又如何?中介与企业会否自律?投资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保障呢?

香港的上市制度在近年不断改革,其中对保荐人的要求不断提升,笔者站在投资银行的最前线,面对企业及监管要求,也有一定的体会。不过,伴随着更为严格的要求,近期香港市场却出现了大量品质欠佳的新股;更有甚者,若干新股上市后不久,业绩就迅速变脸,令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。香

港新股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?

上周,香港交易所举行业绩发布会,领导层在被问到近期新股表现的问题时,有这样的回应:“香港的系统真的很棒!”的确,香港的新股发行完全由市场供应及需求自行调节,实在有其可取之处。细看今年的头七个月,在香港上市的新股有77家,数目可谓近年之冠。然而,接连有新股上市不久便发生盈利预警等问题,新股品质的下降引发广泛关注。笔者接受财经媒体访问,屡屡被问及对于约八成新股的招股书没有披露盈利预测有何看法。

在昔日新股上市旺季时,新股企业和保荐人无不以盈利预测作为卖点,如四大新股包括友邦保险、工商银

行、农业银行及中国银行,都向投资者展示自己未来的赚钱能力。

现在的情况刚刚相反,翻看今年1~7月在香港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77家新股的公开信息,只有14家(占总数的18.2%)在招股书披露盈利预测,其余63家都没有披露,后者比率达81.8%。其中,还有一些上市不久就发出盈利警告的新股。

一直以来,香港股市上市规则并无硬性规定,要求新股必须在招股书中提供盈利预测,披露与否属自愿性质;而港交所亦表明,并不认为没有提供有关资料会构成风险因素。

不过,无论招股书有否披露盈利预测,上市申请人都要向港交所提交盈利预测备忘录和现金流量预测备忘

录,若申请人决定不披露盈利预测,保荐人和承销商要向港交所承诺,该新股上市前,不会在其编写的分析员报告中,提供任何有关盈利预测或性质相近的财务资料。

从投资者的角度看,盈利预测是反映新股前景的重要指标,颇具参考价值,若招股书缺乏相关资料,无疑削弱新股透明度,近期香港市场新股接连出事,只会减低市场对新股的信心。

新股上市前往往亮丽,上市后情况却急剧转变,市场难免希望监管机构应该强制新股披露盈利预测。从市场运作角度看,对一般机构投资者而言,他们通常不会认购没有盈利预测的新股。若申请人和保荐人宁愿失去一些投资者,也不在招股书中列入盈

利预测,难免引起市场的遐想。的确,在新股上市监管要求大幅收紧的环境下,若招股书包含更多的前瞻性资料(例如盈利预测),中介机构的责任和风险将大为增加。不少中介机构甚至是企业觉得明哲保身比投资者的知情权更为重要,为求自保,中介机构偏向不披露一些不太确定的资料。

笔者赞成强制新股披露盈利预测,若出现一些非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,新股实际业绩明显偏离预测数字的话,申请人和中介机构都可能会上若干责任,不排除监管机构认为中介机构需要为招股书失实负刑事责任的。

投资者无论在何时何地,为求自保,还是要多做功课,以防堕陷阱。(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)



【说法不武】

建议修改《公务员法》,从法律上对“裸官”作出明确界定,并明确规定公务员有义务如实报告“裸官”问题。

刘武俊

作为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,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燕日前辞职引起广泛关注。媒体质疑她是因为“裸官”辞职,媒体调查发现,虽然刘燕辞职有其个人原因,但多个信息来源表明,刘燕确属“裸官”,她本人也已承认其丈夫拥有海外户籍多年。

刘燕“裸官”身份长期不为人知,直到最近辞职才被曝出来,这反映出当前治理“裸官”制度还存有漏洞。早在2009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规定“裸官”不得重用,早就是“裸官”的刘燕却多次得到组织部门的提拔重用,有关组织部门显然存在监督失职的问题。看来,“裸官”的信息公开和监督治理依然是“裸官”治理的软肋。

目前,全国裸官摸底结束,江西等十余省市避谈“裸官”数量。至7月底,各省份“裸官”摸底调查基本结束。各省份组织、纪检等部门,已基本掌握了本省的“裸官”数量。初步排查发现了多少名“裸官”?十余省市均回应“具体数据不便透露”。

有关地方和部门连公开“裸官”数量的勇气都没有,让老百姓如何能信服其真格治理“裸官”?“裸官”数量本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,是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的信息公开内容,不存在任何涉密问题,至于某些省市将“裸官”数量归为影响地方政府形象的所谓“敏感问题”,纯属害怕接受公众监督的心虚体现。

建议修改《公务员法》,从法律上对“裸官”作出明确界定,并规定公务员有

义务如实报告“裸官”问题。目前的“裸官”规范文件大多数是党的文件,《配偶已移居国(境)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》将“裸官”的范围界定为“国家工作人员”而非非各级党的领导干部,显然国家工作人员并非都是共产党员。因而有必要修改《公务员法》等法律,明确界定“裸官”的概念和构成要素,以便有的放矢地治理;明确规定如实报告“裸官”问题是公务员准入和考核的基本条件之一。

“裸官”必须在阳光下让公众“裸观”,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。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全面掌握“裸官”的情况,及时监控“裸官”的动向,并向公众全面公开“裸官”的数量和名单。这就需要切实做好“裸官”的申报、登记和公开工作,做到如

实申报,严格登记,及时公开。申报登记切忌走形式,对虚报申报和漏登不登要予以问责。可考虑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,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,有关部门要及时接受公众的举报,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情况。监控“裸官”仅靠纪检和组织部门是不够的,还要广泛发动所有能盯紧“裸官”的社会力量,以最广泛的公众参与之力,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。

从一定意义上讲,对“裸官”的“裸观”和严管其实也是对“裸官”本人的保护,是对其政治生命和个人前途、家庭幸福的爱惜和保护。防止“裸官”蜕变为贪官,本身就是对“裸官”的保护。让“裸官”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群众

的“裸观”,并建立起常态化的严管机制,“裸官”的贪腐行为自然无处遁形,既能防止“裸官”蜕变为贪官,也能防止“裸官”的非法外逃。

一言以蔽之,“裸官”数量岂能成为一笔糊涂账,有关部门岂能对“裸官”数量打哑谜。公开“裸官”的具体数量乃至具体名单,是治理“裸官”问题的必要条件,也是公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前提,更是有关部门无权推卸的信息公开义务。

有关部门应为刘燕“裸官”事件给社会一个明确的说法,并就可能存在的失职予以问责。公职人员队伍中还有多少“刘燕”尚未查清和公开“裸官”身份?还有多少“刘燕”尚未得到组织部门的调整和监督?公众有权得到答案。

(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)



【龙门说棧】

经济界人士一直认为,7%的增长,是保持国内就业的经济增长底线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

龙门

毋庸置疑,我们面临的是极为艰难的结构转型问题,以及严重的债务问题。这两个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,弄不好,可能会出现债务危机和金融、经济危机。房地产价格的泡沫问题很严重,是危机的最可能的源头。所以,在此大环境下,做好国内的投资和理财,是极为艰难的。我的判断是,如果本届政府能在第一个任期内把上述问题解决好,并不使危机爆发出来,就是最大的成绩了。所以,在接下来的5年,我们在大概率上,是见不到A股市场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的。不过,固定收益市场还是有机会的。

我们的宏观经济积累的问题,是

由于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造成的。这个方式已经达到了极限。如果我们继续维持7%以上的增长,还是必须依靠投资,因为居民消费中短期内是起不来的;因为国富民穷的状况是个将长期存在的问题。出口呢,我们自己掌控不了。如此,如果我们继续要守住经济增长7%的底线,是很不适宜的,它将导致宏观经济的痼疾进一步累积,继续制造过剩产能。

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,也是希望所在。但是结构转型的难点在哪里?是国内资金成本的高企。高达7%、8%甚至更高的资金成本,大大限制了结构转型。因为,实体经济尤其是创业性的创新性中小企业,是很难承受如此高的资金成本

的。实体经济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资金成本?而国际上的资金成本,也就是我们的一半还不到,而我们的实体企业又不能到境外融资。那么,是什么原因,导致了我国资金成本的高企呢?就是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导致的。因为,政府主导的投资,主要是房地产、基础设施,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是典型的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行业,他们甚至可以接受10%以上利率的资金成本。所以,是他们拉高了中国国内的资金成本,而且他们对资金的需求是没有上限的。所以,中国如果为了守住7%的增长底线,是会导致继续依靠投资,继而继续拉高资金成本,并继续抑制结构的转型。所以,中国如果要下决心实施经济结构转型,就要允

许经济增长低于7%,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到3%到5%的合理水平,大幅减少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,以拉低资金的成本,支持新兴实体经济的发展。

中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一直认为,7%的增长,是保持国内就业的经济增长底线。我认为,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?因为,我们的GDP总量,已经高达50万的数量级了,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。即使把增长的速度降低到3%到5%,增长的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这个绝对数,是足够保持合理的就业水平的。我们最害怕的是,经济增速的降低,会导致就业的失速,从而导致社会问题。但是,我们忽略

了经济增长的绝对数概念。4%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带来的经济总量的绝对数,难道不能确保一个可以接受的就业率吗?况且,国家是可以把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资金,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和失业救济基金的。甚至,政府还可以把用于投资的存量资金的一大部分,用来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,也可以拉动消费,使经济增长因消费的振兴而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。一举多得,何乐而不为?我们的政府的决策层,为什么就不能换个思路、换个方式来调控经济,来达成一个可持续的、受到人欢迎的多赢的局面呢?

(作者系金融界人士)

中国经济增速不妨降到4%左右

广场舞与涂鸦

李劲

不知从何时起,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舞蹈:广场舞。每天夜幕降临,以大妈们居多,数十、数百或任何一群人,在家附近广场或任何一块见缝插针的空地,一起跟着录音机播放的流行音乐或任何一种音乐,跳起欢快的舞蹈。跳广场舞的人很多,越来越多,开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,这个纪录每天都在刷新中。

由此,引发了很多议论,有赞有弹,弹的理由是扰民。城市空间狭窄,大家挤在住宅区旁跳舞,人多,吵吵嚷嚷,音箱开到最大,不扰民才怪。“扰民之说”说明广场舞发出的动静是彻头彻尾的噪音——高山流水怎么会扰民呢?广场舞不好听,更不好看——六十岁的人跳“小苹果”能好看吗?审美价值还不如第八套广播体操呢。对一窝蜂的广场舞,大部分人是理性点赞

和无奈容忍的态度,这是中国的传统;少数服从多数,个人服从社会,小的服从老的。不少人暗恨广场舞,咬牙切齿,为了破坏广场舞,扔西瓜皮、泼污水、丢水瓶,连钢珠枪都用上了。袭击者违法,自不待言。但是,广场舞噪音扰民,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,绝非长久之计。

联想到城市涂鸦。它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布隆克斯。最初,市政当局大力抓捕涂鸦者,清洗噩梦一样的墙上涂鸦,和中国城管驱赶小贩一样。今天,涂鸦已经成为登堂入室的艺术和时尚潮流不可或缺的部分,涌现了很多涂鸦大师,并且蔓延到了全世界。涂鸦是人的老毛病,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。人们在猎杀巨兽或打了胜仗之后,沾沾自喜,在石壁上乱涂乱画。现代涂鸦一诞生,游戏规则就建立起来了,煞有其事,绝不苟且。喷漆罐、可挥发墨水笔等工具非常专业,涂鸦创

作有一定的范式,涂鸦的地点也是精心选择的,自由不羁的只是他们的精神。后来,涂鸦和朋克、街舞、摇滚乐融为一体,成为HIP HOP文化的一部分,不断向前走,不断变异,不断新生。现在,CHANNEL、LV也生产涂鸦香水和涂鸦包了。

跳舞也是人们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老习惯,是不可扼止的刚性需求。五花八门的广场舞不是简单的锻炼身体,它寄托着中国大妈们对城市新生活的一切感受。广场舞跳好了也是街头艺术——跳不好会挨汽水瓶。广场舞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涂鸦。

对于晚年生活内容贫乏的中国大妈来说,广场舞是一件有益身心、惠而不费的好事,支持者很多,境遇比当年的涂鸦好多了。广场舞不能用在未来的城市生活中,取决于两点:一、有没有底线?涂鸦的底线是不涂私宅,广场舞的底线是夜间噪音不超过50分

贝,二、能不能弄好点?既然走上街头,就应该弄好点,可以吸收年轻人进来,就二人转、舞狮、跑旱船、武术都融合进来……不白舞一回。

邻居有一位东北大妈,是骨灰级的广场舞迷,还是一个LEADER。

每天晚上出去跳舞,进电梯,不停打电话,总拔错号码,大声给舞伴们布置工作。晚上跳完舞回来,背子上缠着毛巾,汗流颊背,满脸笑容,幸福指数爆表了。她总是带着一个巨大的环保袋,鼓鼓囊囊,装着很多东西,都是跳舞用的。她喜欢拿出来给别人看,有一对硬木棒,还有一对小铜锣,都是用来打节奏的,人少时敲木棒,人多了敲铜锣。凭着木棒铜锣,大妈成了广场舞的领导。小铜锣上系着红绸带,一敲振天响。在电梯里听过敲锣的人几乎失聪了。大妈又翻出一沓宣传单:颐养天年投资计划、亚健康口服液、远红外太空磁经络治疗仪等等。东北大妈跳完广

场舞,就开始派发宣传单,据说卖了不少东西。慢慢地矛盾出来了。有一天,东北大妈和舞伴发生龃龉,称病在家,不去领舞。原想拿大家一把,不想有一个四川大妈挺身而出,当晚就顶替了她的位置。她忙下楼,遛遛上前,舞伴们爱理不理,让她好没趣。后来,东北大妈回了老家,杳无音信。再后来,这些舞者发生分裂:一拨儿跳红色歌曲,一拨儿跳交谊舞,一拨儿练太极拳。三拨儿人争场地,达成协议,划地为界,各玩各的。可是三种音乐掺在一起,乱套了;红歌跳得凝重如哀乐,交谊舞情绪激昂带着革命风采,太极拳舞出探戈的节奏。舞伴们闲聊,开始念叨东北大妈组织得好云云。

一看广场舞,酷似涂鸦;再看广场舞,实非涂鸦;展望十年后的广场舞,很可能还是今天的样子,十分尴尬,令人无法评说。

(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)



【言无不劲】

一看广场舞,酷似涂鸦;再看广场舞,实非涂鸦。